

战略文化视角下的中国古代天下主义

侯长坤

内容提要 天下主义多次成为中国意象的代表,却一直未能成为一个系统理论。从战略文化的角度来看,天下主义的众多分支或许可以凝聚为一个体系,既往研究在其体系中也代表了不同方面,例如,身份建构、对外政策、制度安排等方面。然而,天下主义的战略文化研究仍过于粗糙,在概念化的基础上需要进一步类型化,以期天下主义研究能与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对话,并使世界了解中国。古代中国的秦、汉、唐、宋四个王朝,体现了天下主义的战略主文化之下四种亚文化类型,即“名天下”“强天下”“柔天下”“弱天下”。天下主义的战略主、亚文化界定与划分及其在古代中国的体现,有利于天下主义研究对古代中国历史各战略时期的梳理、对当代中国战略制定与走向的把握。

关键词 国际政治理论 中国 天下 天下主义 战略文化
秦朝 汉朝 唐朝 宋朝

* 侯长坤:台湾大学政治学系博士研究生。

** 笔者感谢台湾大学政治学系张登及教授、石之瑜教授、张佑宗教授在本文写作过程中给予的帮助,感谢韩定国先生和郑依萱女士对本研究的支持与鼓励。感谢《国际政治研究》匿名评审专家的意见和建议,文责自负。

中国的战略文化是什么？中国的战略文化如何分类？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绕不开“天下”。古代中国大多朝代统治者称为“天子”，在统治者所认知的疆域都为“天下”，“天下”一词，充满着对山河一统的气魄、对和谐共生的期许、对苍生黎民的关怀，甚至还有扩张征服的野心。对天下的情结、天下主义或许最能归结为中国的战略文化。^① 在当代学者看来，天下主义可以是一种身份的归一，可以是导出国家行为的一种战略文化中介机制，也可以是与外国相处的制度安排。天下最能以战略文化研究的视角理解，因为既往研究大多围绕有关身份、国家行为、制度安排对天下进行探讨，而战略文化研究能够让研究者通过这一途径同时理解诸多方面。

既往关于天下主义的研究，不论是“分封”“礼乐”“德治”三种天下制度，^② 还是“共天下”与“各天下”的对立，^③ 或是“天下为公”“天下有序”“天下无外”三种面向，^④ 或是“汉化天下”与“非汉化天下”“汉族天下”与“多民族天下”的四分，^⑤ 或是“美式天下”与“中式天下”的分立，^⑥ 都不能给出一个便于衡量、详细的分类。

因此，可以把研究问题归结为“天下主义是什么样的战略文化？”为回答这一问题，本文回顾了既往对天下主义研究的分类，参照主流国际关系学界对战略文化的分类方法，将这种方法对应到天下主义的亚文化分类的研究上，通过

① 学者有关“天下”作为中国代表意象的论述，参见 Feng Zhang, “The Rise of Chinese Exceptional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19, No.2, 2013, pp. 305-328; Chih-yu Shih, “Assigning Role Characteristics to China: The Role State Versus the Ego State,”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Vol.8, No.1, January 2012, pp. 71-91; Shaun Breslin, ed., *A Handbook of China'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Routledge, 2012; [日]渡边信一郎：《中国古代的王权与天下秩序：从日中比较史的视角出发》，徐冲译，北京：中华书局 2008 年版；[日]安部健夫：《中国人的天下观念：政治思想史的试论》，《元代史的研究》，东京：创文社 1972 年版；葛兆光：《何为“中国”？：疆域、民族、文化与历史》，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

② 赵汀阳：《天下的当代性》，北京：中信出版社 2016 年版。

③ Chih-yu Shih, “Bound to Relate,” in Huiyun Feng and Kai He, eds., *China's Challenges and International Order Transition: Beyond “Thucydides's Trap”*,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20; 石之瑜、林广挺、汤名晖：《科学的国际“关系性”：天下，软实力与世界秩序》，《国际政治研究》2019 第 3 期。

④ 侯长坤：《天下的实证研究：春秋战国与当代联盟公共产品、自主权、社会化矛盾》，台北：台湾大学政治学研究所学位论文，2021 年。

⑤ Teng-Chi Chang, “Governing Inter-Ethnic/International Order for China: A Comparison of Tang's Mollification System and Qing's Mongolian Banner System,” *Asian Ethnicity*, Vol.21, No.2, 2020, pp. 305-319.

⑥ Salvatore Babones, *American Tianxia: Chinese Money, American Power and the End of History*, Bristol: Policy Press, 2017.

对秦、汉、唐、宋四个王朝的案例分析,描述了天下主义战略文化特征,及其在王朝不同时期的亚文化体现。因此,本文将天下主义研究与主流国际关系学界进行对话,便于世界理解中国,而古代中国战略文化研究对于当代中国的战略把握也具有重要意义。

一、天下主义战略文化的研究回溯

为回答“天下主义战略文化是什么”这一问题,有必要对天下主义在古代中国战略文化中的作用和定位进行梳理,笔者将有关天下主义的研究分为三类,一是有学者将天下主义作为古代中国的一种身份建构,天下主义作为一种文化,构建了国家身份,以利于国家间互动,带有建构主义特色;二是将天下主义作为对外政策,战略文化作为影响国家对外政策的重要中介变量,天下主义影响外交决策,服从国家利益,带有新古典现实主义特色;三是将天下主义作为制度建设,天下主义建立起的制度,可以促进国家间的和平共处,带有自由制度主义特色。

(一) 作为身份建构的战略文化

这一派从建构主义途径出发,战略文化作为一种安全文化,可以在国际社会的互动当中,对国家行为进行形塑。文化形成了社群的背景知识,这些知识包含了行为体如何想以及如何做等讯息。行为体借助文化编织了“意义之网”(webs of meaning),这种网里面包含了实然与应然的内容,^①它“既是一套评价标准(如规范和价值观),又是一套认知标准(如规则和模型),定义系统中存在哪些社会参与者,它们如何运作,以及它们如何相互关联。”^②这些标准规定、约束、形塑了国家行为。^③

① Friedrich V. Kratochwil and John Gerard Ruggie, "The State of the Art on an Art of the Stat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40, No.4, 1986, pp. 753-775.

② Peter Katzenstein, ed., *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 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6.

③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Amitav Acharya, "How Ideas Spread, Whose Norms Matter? Norm Localization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Asian Regionalis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58, No.2, 2004, pp. 239-275; Audie Klotz, *Norm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Struggle against Apartheid*,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5; Margaret Keck and Kathryn Sikkink, "International Norm Dynamics and Political Chang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52, No.4, 1998, pp. 887-917.

具体而言,建构主义战略文化通过构建身份认同,形成这一套互动规则。身份认同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构建国家认同叙事,包括国家利益认同、民族认同叙事,论述国家利益从何而来,^①民族的兴趣和身份;^②二是构建身份与国家的“自我”感知,因自我身份的定位而产生对威胁的感知,以及面对威胁的反应;^③三是构建差异与他者的身份,从而产生互动;^④四是构建应然层面的道德目的。^⑤

建构主义视角下的天下主义,也是构建了国家身份,进而形成了国家间互动的一套规则,古代中国在这套规则中构建国家认同、“自我”感知、他者身份,从而与其他行为体相互交往。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赵汀阳的“天下体系”,^⑥首先构建了身份认同,他认为,天下是一种世界政治的制度,中国是这种制度下的国家;其次构建自我感知与威胁感知,他认为通过“关系理性”中包含的要素,包括报复规避、“互相伤害最小化”而不是“自身利益最大化”“孔子改善”而非“帕累托改进”,使得合作得以可能,伤害威胁得以最小;再次构建他者身份,在赵汀阳的“天下体系”当中,天下具有无外性(all-inclusiveness),所以,没有他者和差异;最后,构建道德应然层次,即天下的未来性,包括普遍兼容性和共在性。在天下体系中,国家间得以互动,进行“无外”与“内部化”。所以,以赵汀阳为代表的“天下体系”,强调国际社会结构中的社群互动,是一种作为身份构建的战略文化。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柯岚安(William Callahan)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徐进对“天下”也进行了总结。他们认为,“天下”中包含的“大度”“无外”,可以影响对待“他者”的方式,鼓励异己的皈依,而不是

① Alexander Wendt, “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n Power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46, No.2, 1992, pp. 391-425.

② Eric Ringmar, *Identity, Interest and Action: A Cultural Explanation of Sweden's Intervention in the Thirty Years' Wa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③ Brent J. Steele, *Ontological Securit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elf-Identity and the IR State*, New York: Routledge, 2008; Jennifer Mitzen, “Ontological Security in World Politics: State Identity and the Security Dilemma,”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12, No.3, 2006, pp. 341-370.

④ Janice Bially Mattern, *Ordering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dentity, Crisis, and Representational Force*,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⑤ Christian Reus-Smit, *The Moral Purpose of the State: Culture, Social Identity, and Institutional Rationalit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

⑥ 赵汀阳:《天下的当代性》,北京:中信出版社 2016 年版。

导向对异己的征服。^① 赵汀阳在另一著作中,用传统的天下概念将看似矛盾的民族主义和普世主义话语结合起来。^② 这些“天下”都类似于作为身份构建的战略文化。

(二) 作为对外政策的战略文化

这一派从新古典现实主义出发,相关的国际政治研究中的变量包括国际体系的结构,以及结构性调节因素,并重新组织了国内层次中介变量,战略文化就是中介变量之一。中介变量会影响到三类中介层次过程,即对国际体系的感知、决策制定、资源动员或政策执行。^③ 战略文化关系到决策过程的面貌,包括领导人的自主性及他们行动所受的约束,他们的社会化、国内分配竞争,以及解决分歧的机制。^④

战略文化区分为军事(狭义)战略文化和广义的战略文化,广义的战略文化是指根深蒂固的信仰、世界观和对世界的共同期望。^⑤ 战略文化或集体期望形成了政治领导人、社会精英,甚至公众的战略理解。通过社会化和制度化(在规则和规范之中),相关的集体假定和期望会变得根深蒂固。战略文化因而影响国家对国际事务的态度、使用武力的意愿以及民族主义的程度。^⑥

天下主义是广义层次上的战略文化,古代中国在天下主义的战略文化驱动下,会形成特定的政策执行模式。例如,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教授石之瑜认为,天下是一种属于弱者的软实力,弱者可以羞辱强者进行抵抗,又能够在名

① [美]柯岚安、徐进:《中国视野下的世界秩序:天下、帝国和世界》,《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10期,第49—56页。

② 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③ [加]诺林·里普斯曼、[美]杰弗里·托利弗、[美]斯蒂芬·洛贝尔:《新古典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刘丰、张晨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16页。

④ [加]诺林·里普斯曼、[美]杰弗里·托利弗、[美]斯蒂芬·洛贝尔:《新古典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第三章。

⑤ Judith Goldstein and Robert O. Keohane, eds., *Ideas and Foreign Policy: Beliefs, Institutions, and Political Change*,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 Jack Snyder, *Myths of Empire: 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Ambition*,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1; Charles Kupchan, *The Vulnerability of Empire*,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27-29; Asle Toje, *America, the EU, and Strategic Culture: Renegotiating the Transatlantic Bargain*, New York: Routledge, 2008.

⑥ Mark L. Haas, *The Ideological Origins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1789-1989*, Ithaca, NY,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5; Nicholas Kitchen, "Systemic Pressures and Domestic Ideas: A Neoclassical Realist Model of Grand Strategy Formatio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36, No.1, 2010, p. 132.

分秩序上与强者相互确认并获得软实力。^①同时,天下研究途径不在于秩序的具体内容,而在于如何因为必须发展互动关系,而导致秩序出现、受限或崩解的过程。联盟中的主要行为体是否具有天下主义思想,决定了国际联盟公共产品提供、自主权转让、社会化的成功。^②这都体现了天下主义作为一种战略文化对国家行为体的行为起到制约作用。

(三) 作为制度安排的战略文化

新自由制度主义认为,国际社会中的和谐、合作与纷争都是源于制度安排。基于这一假设,战略文化在政策做出调整之前,若能使得:(1) 每个行为者的政策(不考虑其他行为者的利益)都被其他行为者视为促进它们目标的实现,产生和谐;(2) 或是政策在被其他行为者视为阻碍它们目标的实现后,做出政策调整,使得行为者的政策变得与他人的政策更相容了,产生合作。^③那么,战略文化就起到制度安排的作用。^④

具体而言,行为者的信念会形成未来行动的框架,每一种行动必须作为这些认知和制度的后遗影响加以阐释。战略文化就构成这样一种信念。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名誉教授克里福德·格尔兹(Clifford Geertz)把文化看作是“人们为它们自己创造的意义的网络”,^⑤在世界政治中,人类也在编织着“意义的网络”,他们发展出的行为标准,有些强调主权原则,其他行为标准可能依靠十分不同的原则。任何合作或表面的合作行动,在其含义得到准确的理解之前,都需要在这些相关行动、盛行的期望,以及共享的信念的环境中得到解释。^⑥随之形成的国际机制,就能够帮助我们描述合作与和谐共处的模式,解释合作、和谐与纷争的问题。

天下主义就可以作为战略文化,发展出的行为标准,在相应强调的原则上,开展诸如合作的国家行为。例如,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张登及认为,天下可以成为民族间或国际秩序的治理模式,如唐朝安抚制度、清朝蒙古盟旗制

① 石之瑜、林广挺、汤名晖:《科学的国际“关系性”:天下,软实力与世界秩序》。

② 侯长坤:《天下的实证研究:春秋战国与当代联盟公共产品、自主权、社会化矛盾》。

③ [美]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苏长和、信强、何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④ 虽然赵汀阳强调他研究的天下体系是一种世界政治的制度,但他更多强调的是“无外”的身份,因而属于身份建构的范畴。

⑤ Clifford Geertz,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3.

⑥ [美]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第56页。

度,这两种制度使得多民族共存。^①在当代实践中,这种天下主义还体现在“美式天下”与“中式天下”争鸣的过程之中,这种争鸣实际上体现了多元等级制,类似的朝贡体系、多元朝贡也体现了这种多元等级制,也属于这一天主义类型。例如,悉尼大学教授萨尔瓦多·巴博内斯(Salvatore Babones)提出“美式天下”,认为当今美国就是在全世界天下的核心位置,这种美式天下体现在全球各个领域。在当今这个普遍联系的世界中,中国的商业活动,俄国的大选,甚至包括伊朗的革命,都在“美式天下”轨道上运行着。^②当“中式天下”与“美式天下”同时展开论述的时候,在理论上就出现了“二元天下”的局面,相关学者各自表述各自的中心。同时,也正因为存在这种各自为天下的表述,使得中美两国可以各自主张自己为天下,并得到满足感,在实践上如宋朝与契丹、汉与匈奴、唐与突厥,甚至当代中美之间存在互不侵扰,因为此时作为“天下”的行为体,不具全局压迫性,而仅仅统御其所在区域。天下作为制度安排功能的战略文化,使得国家间减少了纷争。类似情况还出现在朝贡体系理论当中,虽然朝贡体系理论中提出朝贡体系有被中国统治者用于自卫的政治目标,^③但朝贡体系理论强调的是多中心(多个自我中心主义),以及在多中心基础上名与实的分离(各自表述各自为中心)。^④

另有张登及等追溯天下“五服”,认为中国的朝贡体系通过“事大原则、守在四夷、厚往薄来、兴灭继绝”的实践原则,构建“天下秩序”,处理邻国关系,并且用政治面向、经济面向等指标检验中国与缅甸、越南、柬埔寨和泰国四个邻国关系的案例;^⑤日本京都府立大学文学部教授渡边信一郎也认为,“天下秩序”付诸实践,即建设“朝贡体系”;^⑥台湾大学历史学系名誉教授高明士则认

① Teng-Chi Chang, “Governing Inter-Ethnic/International Order for China: A Comparison of Tang’s Mollification System and Qing’s Mongolian Banner System,” pp. 305-319.

② Salvatore Babones, *American Tianxia: Chinese Money, American Power and the End of History*, Bristol: Policy Press, 2017.

③ 朝贡体系理论于1941年由费正清、邓嗣宇较为体系地提出,他们二人不是最早适用这一术语的,应是沿袭而来。参见张锋:《解构朝贡体系》,《国际政治科学》2010年第2期,第33页。

④ John K. Fairbank and Ssu-yu Teng, “On the Ch’ing Tributary System,”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6, No.2, 1941, pp. 135-246; 任晓:《论东亚“共生体系”原理:对外关系思想和制度研究之一》,《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7期,第4—22页。

⑤ 张登及、陈莹羲:《朝贡体系再现与“天下体系”的兴起? 中国外交的案例研究与理论反思》,(台湾)《中国大陆研究》2012年第4期,第89—123页。

⑥ [日]渡边信一郎:《天空的王座:中国古代帝国的朝政和礼仪》,东京:柏书房2000年版;王德权:《在东京与京都之外:渡边信一郎的中国古代史研究》,《新史学》2006年第17卷第1期,第143—202页。

为,“天下秩序”与“天下法”,是中国历朝为处理与周边诸部族国家的关系所建构的一套完整的思维与实际操作办法;^①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王庆新提出儒家王道精神存在与现代国际秩序相融合的可能路径;^②迈阿密大学政治学系教授金德芳(June Dreyer)则指出,天下制度支持者认为,如果在今天的世界中采用天下,将大大改善无政府主义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③ 这些“天下”都类似于作为制度安排的战略文化。

以上三派对天下主义这种战略文化从不同层面进行探讨,各自有所区别,总结而言在类型化上具有理论意义。然而,国家的战略文化实际上不会在这三种类型中短时间转变,因而,这样总结之后的分类,虽然给出一个大致的框架,但分类并不精确,类型之间有很大的变化空间。如果要描述中国天下主义这种战略文化,需要给天下主义一个强弱(或是程度)不同的光谱,以准确定位中国战略、预测中国战略走向。值得借鉴的是乔治梅森大学沙尔政策与政府学院教授柯林·迪克(Colin Dueck)对美国战略文化内涵界定,^④以及战略文化类型的划分。

二、理论构建:战略文化的类型化

柯林·迪克探讨了美国战略文化的延续与转变,更重要的是他给战略文化分类提供了参考。迪克回顾了既往战略分类方法。例如,美国战略学者爱德华·勒特韦克(Edward Luttwak)的“扩张主义者”战略和“现状主义者”战略,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查尔斯·库普乾(Charles Kupchan)的“强制性”“威慑性”“适应性”战略,温哥华大学名誉教授江忆恩(Ian Johnston)的“妥协主义”“防御主义”“扩张主义”,等等。这些划分在笔者看来过于宏大,几乎是冲突主义与合作主义、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单边主义与多边主义之类的宏观划分。虽然这些分类对战略文化的类型化具有一定意义,但大多数国家

^① 高明士:《天下秩序与文化圈的探索》,上海古籍出版 2008 年版。

^② 王庆新:《儒家王道理想、天下主义与现代国际秩序的未来》,《外交评论》2016 年第 33 卷第 3 期,第 73—99 页。

^③ June Teufel Dreyer, “The ‘Tianxia Trope’: Will China Change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24, No.96, 2015, pp. 1015-1031.

^④ 此借鉴并非说明天下主义就是自由主义,而仅仅是因为柯林·迪克在战略文化研究中提供了一种分类方法,供研究者借鉴。借助西方所熟知的分类方法,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对话,以传播天下主义战略文化,构建中国范式。

不会遵循纯粹的防御战略或进攻战略这种界限分明的选择,因而,在描述一个国家的战略文化及变化时,这样的分类方法不够精确。

迪克借鉴了战略调整的研究方法,“一个更有效的方法可能是思考国家是否扩大、收缩或以任何方式显著改变了其总体战略承诺,即是否有战略调整”。^①他首先论证且锚定了美国的战略主文化为自由主义,自由主义具有“势力范围”(sphere-of-influence)的扩张与“有限责任”(limited liability)的限制两大特征。对于这两大特征的调整或偏移的探讨,他又分出四种战略亚文化,即国际主义、民族主义、进步主义和现实主义。“势力范围”特征根植于国际传统,包括“十字军派”,他们认为美国要在国外促进自由与民主,必要时可以动用武力,是一种干涉主义;另一派为“模范派”,他们认为美国要推广自由主义思想,但不干涉军事冲突,要为自由提供庇护。“有限责任”特征根植于国家传统,是一种功利主义,该特征认为美国可以扩大商业关系、减少政治联系、拒绝过多承诺,以服务于国内利益。有关主文化的调整或偏移,则引申出四种战略亚文化。亚文化之一国际主义,是强烈的自由主义,国家“有限责任”特征很弱;亚文化之二民族主义,是软弱的自由主义,国家坚定“有限责任”;亚文化之三进步主义,助长了“有限责任”特征,但国家也会通过和平手段促进国际秩序;亚文化之四现实主义,国家不是推行自由民主(虽然有一定承诺、假借自由主义之名),而是促进国家利益。这样的四分体现了主战略文化的不同侧重特征、不同方面。

迪克在《不情愿的十字军》(*Reluctant Crusaders*)中最重要的学术贡献是界定美国战略主文化的特征,以及亚文化的调整,因而读者更能够理解美国的战略延续或改变。例如,从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途径来考虑,国际形势(最重要的长期影响因素)、主导战略文化(决定特定文化的吸引力)、国内政治(政治联盟)、政治领导(总统),这四种因素影响战略文化的主导地位。国际压力(外部冲击)和选举轮替决定了战略文化的基本方向,战略文化通过两种机制对战略成果产生重要影响:一是议程设定,二是联盟建设。战略延续或改变的条件则包括四个方面:一是时机,外部冲击、选举轮替;二是达到国际层次影响力;三是支持者,如总统;四是文化上的共鸣。通过过程追踪、控制变量比较、反事实观察的研究方法,迪克概括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冷

^① Colin Dueck, *Reluctant Crusader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9-20.

战后及小布什政府后,美国面临诸多战略选择,分别选择了民族主义、现实主义、进步主义与国际主义。

迪克对美国战略文化的类型划分,对其他国家的战略文化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中国的战略文化研究可以借鉴迪克提供的分析框架,在这一分析框架之中,中国战略文化仍有战略辩论,形象的来比喻,战略辩论出现了四种可能——强迫着来、慢慢来、不往来、自己乱来,^①四种可能作为途径最终到达战略目的。这一框架对中国战略文化分类具有启示。

中国的主文化是天下主义,^②相应地,天下主义的主文化特征也包括与“势力范围”和“有限责任”对照的“打天下”和“守天下”,^③但“打天下”是天下主义战略文化中的惩罚或感化,包括使用武力的军事手段,也包括为政以德、使人民归附的非军事手段,而非自由主义战略文化中简单的干涉主义,“守天下”是天下主义中的保家卫国及休养生息的概念,要求统治者使天下太平、山河稳固,政权之间互不干扰,而非自由主义中简单的孤立主义。

在天下主义战略文化当中,四种亚文化特征其实是同一个向度(sphere),也就是要不要积极推动正确的天下这种名分秩序(推行这种天下秩序即是古代中国的战略),^④如果要积极的话,是选用惩罚或强行的手段推行天下(强天下),还是选用感化或示范的柔性手段推行天下(柔天下);如果不积极的话,是什么都不做的无为,仅关注本政权的稳定,与其他政权共存于天下(弱天下),还是自己在破坏名份秩序、以天下的名义兼并天下(名天下)。

因此,在古代中国战略文化中,除了积极与不积极推行天下的向度,还有一个向度,针对叛乱群体和北方游牧族民族等族群的战略问题,这类战略问题是剿抚问题、和战问题、恩威问题,也就是在考虑,是要选用军事手段把对方打跑或镇压,还是选用馈赠或和亲或封王的方式安抚对方。在潜在威胁不断、不考虑推行天下的情况下,古代中国王朝的主要问题就是如何让敌人不要来犯,

① 中国战略文化与美国战略文化存在区别,美国自由主义战略文化从是否积极推行自由改造价值和是否使用军事强制性手段来划分出四种可能。对比而言,中国战略文化从是否积极推行天下名分秩序(是一种关系而非价值)和是否使用强制性手段划分出四种可能。

② 例如,从古至今中国的统治者被称为“天子”,另见对中国意象的归纳,Shaun Breslin, ed., *A Handbook of China'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Routledge, 2012。

③ 张其贤认为,“天下”此概念分别有“扩张主义”或“隔离主义”的含义,与笔者的划分类似。参见张其贤:《“中国”与“天下”概念探源》,(台湾)《东吴政治学报》2009年第3期,第169—256页。

④ 因为,在美国的战略文化里,国家之间没有天下所涵盖的那种关系,国家之间互不隶属,所以才会有要不要改造人家的问题;然而,在中国的战略文化里,国家之间必然有天下的关系,因此出现了自己能不能在天下各地被接受的问题。

叛乱不要四起。

在第一(名分秩序相关的)向度中,古代中国王朝只要确保体系内有名分秩序,即使王朝强大也不会继续征伐,若体系内没有名分秩序,即使弱小也要努力去争取建立名分秩序;在第二(剿抚相关的)向度中,古代中国王朝在强大之时才得以使用军事手段进行,弱小时仅能使用安抚手段,来应对剿抚的战略问题。这种情况与美国在强大之时就注重“势力范围”,在弱小之时就注重“有限责任”,有本质区别;同时,古代中国战略文化中的这两类向度同时存在的情况是迪克的研究分析框架没有考虑到的。

两种向度匹配构成四种战略亚文化,体现了主文化的不同侧重方面与特征。如前文所提及,中国的四种亚文化的内涵为强天下、弱天下、柔天下、与名天下。^①这四种亚文化将在下文对应具体的案例进行说明。强天下可对应汉朝与匈奴的案例,柔天下对应唐朝与突厥的案例,弱天下对应宋朝与辽金夏的案例,寻求稳定的案例,名天下对应秦国统一六国的案例,以天下名义增加国家利益的案例。

三、案例检验:主文化与亚文化的确立

作为古代中国的战略文化,天下主义来自历史沉淀,同时更多是后人的总结。在天下主义的相关思想论述中,笔者将总结出主文化的相关特征,亚文化也正是从中衍生出来。

与此同时,这些主文化之下的亚文化探讨引申出一个明显的问题:如果这四种亚文化都是古代中国的战略文化特征,那么,一种亚文化如何在特定历史时期胜过另一种亚文化,并保持优势?^②这一答案需要考察国际形势与国内政治,以及当下的战略文化惯性影响。国际形势主要是指如国际压力的外部冲击,国内政治主要考虑战略文化影响国家决策的两种机制:国内议程设定和国

^① 相比而言,美国没有中国那种有关名分秩序的压力。对美国而言,要不要改造其他国家,由美国自己片面就可以决定。在中国的战略文化里,出现了自己能不能在天下各地被接受的问题,如果不能被接受,就会想着用第一向度的各种方式去推行天下,而没有内外的区别。可见,中国战略文化完全不需要与美国的战略文化、“十字军东征”混淆在一起,研究在借鉴西方分析框架的同时,能够修正、改造分析框架,为中国战略文化研究所用。

^② 需要注意的是,具体某一皇帝当朝时期,与时限更长的整个王朝时期,其所产生的战略文化二者不能等同,本文拟寻找具有整个王朝时代的基调性与代表性的战略文化,并以此来作为该王朝的天下主义战略亚文化。

内联盟建设。^① 在国内议程设定阶段中,主要国家官员是议程的关键制定者,是新思想和政策成果之间的关键纽带,领导者利用他们的影响力来决定哪些战略构想将被提出,以供参考。^② 在国内联盟建设阶段中,联盟的建立过程决定了领导者提出的构想能否付诸实践,领导者需要通过说服、施压、谈判来为他们所偏好的策略赢得(国内外最低限度的)支持。^③ 因此,联盟的建立涉及国内外两个层面的权衡,以及两者与行政部门偏好之间的权衡。^④ 最后,当下的战略思想也能够巩固政治联盟。因此,一个亚文化获得优势、战略文化延续或改变的条件是:一是时机,有外部冲击;二是达到国际层次的影响力;三是国内层次有支持者;四是与当下的文化环境有共鸣。

因此,除了需要论述主文化的相关特征,还要论述相关特征衍生出的亚文化是如何通过国际与国内因素,在特定历史时期获得优势。

(一) 主文化:天下主义

“天下”是中国的世界概念,此概念以特定的秩序原则来表示影响的空间和地域和周边的关系。这种影响可以是,以统一的方式凝聚天下、以德治的方式教化天下、以和谐的方式共处天下和以扩张的方式控制兼并天下。不同于美国的自由主义主文化,中国的天下主义是国家追寻的一种秩序,如前文所说,古代中国在追寻和推行天下秩序的过程中,有两种大的特征,即追求“打天下”与追求“守天下”,两者都属于同一向度,都在推动天下的名分秩序,“打天下”比“守天下”更为积极。“打天下”是追求将天下理念扩散。例如,周朝建立封建制度是为了怀柔天下,成为天下的共主。^⑤ 天下的概念已从地理概念逐渐

^① 这一研究框架借鉴于 Colin Dueck, *Reluctant Crusader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Richard Herrmann and Richard Ned Lebow, eds., *Ending the Cold War: Interpretations, Causation and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4, pp. 7-8, 14-16.

^② William Riker, *The Art of Political Manipula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6.

^③ 当然,当代西方理论对于中国古代政治实践的解释力是有限的,不能简单照搬套用,需要因地制宜的适当调整。例如,理论框架中的联盟在古代中国可以是指皇帝与官僚等行为者之间的联盟,若皇帝能够独断专行,则联盟可以是皇帝一人。

^④ Barbara Farnham, *Roosevelt and the Munich Crisi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24; Robert Putnam, “The Logic of Two-Level Gam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42, Summer, 1988, pp. 427-460.

^⑤ “故封建之,其怀柔天下也。”《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左传》,郭丹、程小青、李彬源译,北京:中华书局 2016 年版,第 463—483 页。

融合了政治概念,^①比华夏、九州、四海和中原等概念拥有更深一层的含义。各种良好的品质如“恺”(和乐)、“元”(善),会被天下所认可,从而建立文化价值体系。^② 当好的品格被崇扬、不好的品质被抛弃,则“天下如一,以为天子”。^③ 相应地,为了成为天下的“共主”,建立天下体系,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中包含了“得天下”“王天下”“取天下”等学说。^④ “守天下”是限缩责任,守好自己的天下。最常见于道家思想的“无为”,以“无事”取天下。^⑤ 根据天下的形势,来制定天下的政策。例如,“天下有道则与物皆昌,天下无道则修德就闲”,^⑥如果天下大势不利于“打天下”,那么,就老实地“守天下”,不必刻意去追寻天下秩序的推行,也可以守住自己的天下,“帝道运而无所积,故天下归”^⑦“愿天下之安宁以活民命”^⑧“不欲以静,天下将自定”“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⑨

在主文化的不同特征侧重上,天下主义战略文化发展出四种亚文化,即“强天下”“弱天下”“柔天下”“名天下”。四种亚文化根据主文化特征的不同侧重,可以对应不同的中国古代政治思想。获得天下的关键点就在于天下的认可,更为形象地说,^⑩强天下以强行的方式获取天下,其结果是“箪食壶浆,以迎

① 此前的地理概念,参见张其贤:《“中国”与“天下”概念探源》,(台湾)《东吴政治学报》2009年第27卷第3期,第169—256页。

② “昔高阳氏有才子八人,苍舒,隤敷,栒戡,大临,龙降,庭坚,仲容,叔达,齐圣广渊,明允笃诚,天下之民,谓之八恺,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奋,仲堪,叔献,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忠肃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谓之八元。”参见《左传·文公十八年》,载《左传》,郭丹、程小青、李彬源译,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651—660页。

③ “舜臣尧,宾于四门,流四凶族,浑敦,穷奇,檮杌,饕餮,投诸四裔,以御魑魅,是以尧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为天子。”参见《左传·文公十八年》,载《左传》,第651—660页。

④ “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参见《孟子·离娄上》,载《孟子》,方勇译,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27—149页;“故王天下者必先诸民,然后庇焉,则能长利。”参见《国语·周语中》,载《国语》,陈桐生译,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49—97页;“志意致修,德行致厚,智虑致明,是天子之所以取天下也。”参见《荀子·荣辱》,载《荀子》,方勇、李波译,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37—53页。

⑤ “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参见《老子》,汤漳平、王朝华译,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88—192页;“古之畜天下者,无欲而天下足,无为而万物化,渊静而百姓定。”参见《庄子·天地》,载《庄子》,方勇译,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177—206页。

⑥ 《庄子·天地》,载《庄子》,第177—206页。当然,这里的论述可以形容君子修为,同时古代统治者被人格化为天子,因此形容君子修为同样也可以形容天子政策。

⑦ 《庄子·天地》,载《庄子》,第177—206页;又见“夫子若欲使天下无失其牧乎?则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兽固有群矣,树木固有立矣。夫子亦放德而行,循道而趋,已至矣,又何偃偃乎揭仁义,若击鼓而求亡子焉?”参见《庄子·天道》,载《庄子》,第206—224页。

⑧ “夫不累于俗,不饰于物,不苟于人,不忤于众,愿天下之安宁以活民命,人我之养毕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参见《庄子·天下》,载《庄子》,第566页。

⑨ 《老子》,汤漳平、王朝华译,第85—88页。

⑩ 笔者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引用诗文之目的,仅是在研究对战略文化的规范性推演过程中,描述其意象、形象,并非以诗证史之意。

王师”，^①即使出动了王师，但有天下民众的呼应，以箪食壶浆相迎；弱天下以守成的方式守住天下，其结果是“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②即使存在邻国，但也可以和睦相处，共同存在于天下，各自拥有的天下之民对各自政权认可，“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③柔天下以感化的方式赢得天下，其结果是“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④当出现德政、德治之时，天下之民纷纷来归附，出现“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的局面；^⑤名天下以破坏的方式夺取天下，其结果是“率兽食人”^⑥“鞭笞天下”，名天下用天下的名义与幌子，开疆拓土，满足自身国家利益，达到类似“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的局面。^⑦从四种亚文化特征的向度来看，本应按照“强天下”“弱天下”“柔天下”“名天下”的顺序，分别论述对应四个王朝的案例，但依照古代中国的历史顺序，笔者在此做出调整，按照“名天下”“强天下”“柔天下”“弱天下”的顺序，论述秦、汉、唐、宋四大王朝的案例。

（二）亚文化一：名天下

作为亚文化的“名天下”，“天下”只是追求扩张利益过程中的名义和幌子，没有追求天下主义的“道”存在，甚至有时候在实质上破坏天下这种名分秩序，只为兼并天下。这一战略亚文化典型表现在打着追寻“天下秩序”的旗号，进行战略扩张，实现国家利益，将版图扩大至之前未曾拥有之处。例如，战国时期的秦国扩张，就是对名天下的实践。

秦统一六国，使得中国地理、政治和军事制度都被重新定义和制定，相较于春秋战国时期，文化与社会都进行了调整。《荀子》所论述的，圣人的道德力量而非军事领袖的策略技巧，能克服在有限制的区域风俗影响下的士兵行为，但面临隔绝的地形、生存的危机，秦国更加青睐《商君书》及其之后的《吕氏春秋》中的思想及相应改革。地理的隔绝、生存所带来的压力，形塑了秦地尚武风俗与统治者的性格，这种孤僻使得秦国极度依赖严刑峻法，最终吞二

① 《孟子·梁惠王下》，载《孟子》，方勇译，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20—44页。

② 《老子》，汤漳平、王朝华译，第299—301页。

③ 同上。

④ 《论语·为政》，载《论语·大学·中庸》，陈晓芬、徐儒宗译，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15—26页。

⑤ 《孟子·梁惠王上》，载《孟子》，方勇译，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20页。

⑥ 同上，第1—20页。

⑦ 《过秦论》，载《新书》，张彩梅译，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1—9页。

周而亡诸侯,实现了国家利益。以国家利益为目的,扩张、吞并天下,与古代中国其他朝代的天下不同,是为“名天下”,以“天下”之名实现兼并天下的国家利益。

在国际形势方面,秦国不仅要面对地理障碍,还要面对均势和扩张成本上升机制,以及巩固所占领土的困难。秦最早建立于公元前897年,是周朝小属地,当地多山,不宜耕种、相互隔绝;公元前672年,深入到中央区域;公元前340年,商鞅击败魏国;公元前316年,获得四川盆地;公元前314年,打败最后一个敌对戎族;公元前312年,攻克楚国丹阳,保护汉中地区,联通秦国腹地和巴蜀;公元前230至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

春秋战国时期,礼乐崩溃,春秋不再,战国为继,秦国面临着群雄争霸的生存压力。春秋战国多国体系的形成到公元前三世纪初,楚、齐(在两个不同的阶段)、晋、吴、魏等诸侯国相继崛起而又衰落,是均势理论和扩张成本理论的典型范例。这些争霸国因不平衡增长而崛起,又因均势制衡机制和扩张成本上升的制约而衰落。^①秦国在春秋战国体系的最初几个世纪里,一直执行防御性对外政策,在春秋时期扮演平衡者角色。从公元前356年开始,商鞅发起了自强型改革——商鞅变法,利用魏国两次大败于齐之机发动两次战争,夺回了多于被占的领土。秦孝公和他的继任者转向伺机扩张的进攻政策。

在国内议程设定方面,《商君书》及其之后的《吕氏春秋》建立了现实主义进攻、扩张政策的正当性。为了回应统一的渴望与地方割据的紧张关系,《商君书》有助于集权方面的论述,包括自强型改革,使得农村人口组建军队,全民备战。人民“为上忘生而战”,“乐战”,而其他所有的人类价值观或者活动都对国家秩序构成威胁,称作“虱”和“恶”。类似地,《吕氏春秋》总结,“今日君民而欲服海外,节物甚高而细利弗赖。耳目遗俗而可与定世”,高贵声明使秦国对其他诸侯国的征伐合法化。征伐导致了“颂秦德”和“宣省习俗”。否定风俗、地形的作用,超越区域局限,组成秦国的空间理论。这些正当性的构建,关中的尚武精神被扩大,在公元前260年的长平之战中,秦国战争不仅国土扩张,而且要彻底摧毁敌军,确保无反击可能,数十万敌军尽数被坑杀。这种扩张,除天下之外,更多的应是满足国家利益。

在国内联盟建设方面,地方的军人阶级兴起与中央的帝王专权,巩固了秦

^① [美]许田波:《战争与国家的形成:春秋战国与近代早期欧洲之比较》,徐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

国战略部署。秦孝公时期的改革内容,包括:(1)农民转换步兵(吴、越引进),骑兵替代战车,弩、盔甲、铸剑术的发明(吴、越引进);(2)城邦纳入秦国版图,疆域分给农民开垦,替代贵族,收税支撑军事;(3)奖励军功;(4)郡县制与道路规划,形成道路网,农村规整使得军事和国家控制系统连为一体,摧毁农村与城市的社会和制度障碍;(5)将政治组织和血缘结构分割开。^①由此,城市与贵族的障碍被打破,农民得以跻身军人阶级,全民备战以及军事技术支持了秦国战争。公元前307年,一连串政治斗争使得秦国为宫廷大臣联合执政;公元前295年,被诸侯联军击败,之后被赵国骑兵打击;公元前266年,在范雎的帮助下,秦昭襄王夺去魏冉、太后权力。秦王得以专断施行秦国政策。

在国际与国内因素驱动下,秦国“名天下”的占领文化,自商鞅变法的自强型改革后,经过国际形势压力、国内议程设定、国内联盟建设逐渐形成,表现在秦成为战国及秦朝时期的主导国霸权后,依然实行进攻性扩张政策。“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也。”《商君书》思想认为国家要削弱消耗国内人民的力量,如果不这样做,将导致人民道德败坏和好逸恶劳的滋生。因而秦国发动战争不是为了获利,而是为了消耗国内人民,同时越来越多资源被消耗。但当国家无力承担这些消耗时,国家面临崩溃,即陷入帝国的迷思、二世而亡。秦国本为周朝一个小的属地,并无恢复故土的情结的强天下;同时,战国群雄争霸,礼崩乐坏并不允许秦国遵循柔天下;强有力的国内改革,使得秦免于偏安一隅的弱天下;最终,秦国突破了空间局限、道德礼法,实现了国家生存、扩张,因而在古代中国天下主义的光谱中,服从于名天下。

(三) 亚文化二:强天下

作为亚文化之一的“强天下”对“打天下”的侧重较强,对“守天下”有所侧重但稍弱,积极推动,有时是强行的推动天下秩序。这一战略亚文化典型表现在对失地的收复、对国家的巩固。例如,汉朝征服匈奴收复失地,就是强天下的实践。

汉朝继承了秦朝的国家机器,国家版图扩大,在这个角度上可以是类似秦

^① [美]陆威仪:《哈佛中国史:早期中华帝国,秦与汉》。

朝,追求强权政治的“名天下”,汉武帝在其统治后期开始及时战略收缩,^①因而不同于秦朝。平城之战后,汉朝与匈奴的和亲、妥协政策,汉武帝之后及东汉时期放弃边疆政策,^②可以是类似宋朝,追求防御政策、关注国家内部、对外软弱的“弱天下”,但西汉早期政策被汉武帝时期取代,且汉武帝之后以及东汉时期,外部威胁可以抵挡,且存在几次积极有为政策,^③不同于宋朝。汉朝也没有像唐朝那样,可以依赖“天可汗”的非军事手段使得外族归化,虽然尊崇儒学,但也非典型的“柔天下”,而是外儒内法。汉朝特别是在汉武帝时期,使用武力与非武力手段扩大天下主义势力范围,同时尊崇包含儒学、道德力量的天下主义内容,建立国际盟友,因此是“强天下”的亚文化典型。

汉朝面临国内外双重压力。在国际形势方面,公元前209年,汉朝建立前三年,冒顿单于兴起,向东击溃东胡,向西征服甘肃月氏,向北西伯利亚征服游牧民族,向南从秦地收回河套平原。因此,在汉朝成立之初,北方匈奴就对王朝构成威胁。在国内压力方面,公元前210年至公元前202年经历了四个阶段:多地农民起义、群雄并立、项羽试图建立近二十国的联合体、^④项羽和刘邦争霸。故国内形势一是农民士兵阶级希望摆脱暴政,二是旧王室贵族希望恢复地区割据。国内动荡与国际压力,是新生的汉王朝面临的一大问题,因而,汉朝的对外战略文化,受到二者的影响。

在此形势之下,汉高祖完成了内部的统一,同时决定将匈奴赶出中国,以建立对北部边界的控制。汉高祖抓住韩王向匈奴投降的机会,在公元前200年冬天发动了一场针对匈奴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在平城之战(地点为山西大同)中,30万汉军被40万匈奴精锐骑兵包围。平城之战后,公元前198年,刘

① “强天下”与“名天下”的区别是,“强天下”在军事扩张的同时,会宣扬天下主义文化,表现在军事征服之后使用和平手段安抚,而“名天下”一味地军事扩张之后,仍然保持镇压手段。

② 东汉政府断然选择远离不设防的边郡,迁民入关政策,使得西部、西北部文明崩溃,诸羌战争;公元35年,官员鼓动说甘肃河西走廊西部的所有一切都可以放弃,但未被采纳;公元48年,南北单于分裂,南单于臣服,但汉光武帝没有出击北匈奴,而是用长城为界把南北匈奴隔开;公元110年,凉州羌人叛乱,庞参建议放弃凉州未被采纳,次年西北四郡撤回内地,强制迁民。

③ 东汉对待匈奴:公元48年,南北匈奴分裂,公元50年比单于归入汉朝贡纳体制,汉朝设立使匈奴中郎将,监督移入中国陕西的南匈奴;公元89年,汉和帝联合南匈奴击溃北匈奴。东汉对待西域:公元74年,窦宪夺回吐鲁番;公元89年,窦宪打击西域匈奴;公元91至公元101年,班超任西域都护;公元123年,建立对吐鲁番的控制。东汉授予西方纳贡国汉朝官员的称号,赋予称号的持有者以某种合法性和权威性,在汉朝衰亡以后,纳贡国仍长期重视它。东汉对待东胡:公元49年,乌桓进入贡纳体制;公元91年,窦宪打击北匈奴后,鲜卑扩张,时有归顺。

④ 参见[英]崔瑞德、[英]鲁惟一编:《剑桥中国秦汉史(公元前221年至公元220年)》,杨品泉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06页。

敬和亲政策,直到汉武帝统治之初。公元前192年至公元前135年,协议修订九次,汉朝付出更高代价。在虚构兄弟关系下,公元前162年,双方签订条约,“单于”统治中国长城以北的“引弓之国”,长城以南的民众即“冠带之室”,则是汉朝皇帝的统治范围。匈奴违背一个又一个的协议,中国要求战争呼声变高,军事技术增加,公元前134年,汉武帝最终决定发动一场战争来摧毁匈奴。国内压力也在国内联盟建设的过程中解决。

在国内议程设定方面,秦国没能确保人们普遍接受一个绝对专制的权力,汉朝也承认这种现实。汉朝初年流行“不北走胡则南走越耳”之语,^①表明普通百姓与汉朝之间,一种政治上的认同仍需要发展。为此目的,“文景之治”时期,汉朝“与民休息”,汉武帝时期则“独尊儒术”,儒家学说上升为知识的绝对权威,用以巩固王朝统治。虽然汉朝在边缘地区军事化活动,但在汉朝内部是倡导儒家的非军事化,乃至后来长期存在的时新派与改造派的争鸣,^②都表现了对秦朝专制镇压的修正,汉朝不像前朝急于实施法律,但也并非不全面。改造派加入统治辩论,也为汉武帝之后的汉朝奠定了战略基调,自汉宣帝后期开始,除王莽时期之外,汉朝推崇儒家治世。汉末之前的汉朝,既能军事征战,也能与周边小国建立贡纳体系,同时保卫了汉朝的江山稳固。因此,汉朝的征服以及天下主义势力范围的扩大,包含了军事手段的征服,也包括非军事手段的教化。^③

在国内联盟建设方面,一是汉朝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刘邦继承秦朝制度,虽然在东部、南方分封10个诸侯国,但6年内取缔了9个异姓诸侯王。

① 指百姓不是北逃胡方,便是南逃越国。

② 时新派(modernist),倾向于法家思想,包括商鞅、申不害、韩非等思想,相关学说着眼当下的战略利益,主要事件包括,公元前108年,汉朝依靠时新派思想取得外交和军事成就,公元前104年,汉朝依据时新派主张改变礼仪程序,公元前100年,时新派发展达到顶峰;改造派(reformist),倾向于儒家思想,主要事件包括,公元前81年,改造派发出论战,之后改造派政策被朝廷接受,改造派注重传统价值、孔子思想、周礼等。“(时新派和改造派)双方把已知的华夏世界作为一个单位而不是作为若干个国家来治理,汉代的行政常常带有明显妥协的特点。官员们最后能够依靠商鞅或李斯的行政方法,但是,如果没有可以追溯到孔子、孟子和墨翟的人道主义理想的仁慈宽厚,那么,这些方法也证明使人不能忍受。如果没有法家主张的有效控制措施,那么,被描述为儒家的完全井然有序的等级社会理想就经受不住犯罪、反抗或入侵等无情的现实。”参见〔英〕崔瑞德、〔英〕鲁惟一编:《剑桥中国秦汉史(公元前221年至公元220年)》,杨品泉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③ 《荀子》论述圣人的道德力量而非军事领袖的策略技巧才能克服在有限制的区域风俗影响下的士兵行为。《史记》认为,统一的汉帝国扮演着《荀子》中所指的中央政权和最贤明的统治者,这些以前独立的地区,现在都被吸纳到帝国之内。〔美〕陆威仪:《哈佛中国史:早期中华帝国、秦与汉》,王兴亮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

公元前196年,10国被取代(被贬为侯、投靠匈奴、策划叛乱,长沙和平取代),同姓取代异姓。强化“非刘氏而王之,天下共击之”。文景时期,皇帝与同姓诸王亲属纽带松散,(汉文帝、汉景帝)两帝继续削弱王国,公元前179年,吕后诸王被刘氏取代,存在19郡与11国,郡仍需要王国保护;公元前143年,存在40郡与25国,王国成为被郡包围的一块块飞地,地方割据问题得以整治。二是“文景之治”,与民休息巩固了汉朝的基础。中央王朝注意到了贾谊提出的关于防止暴虐政策的警告,轻徭薄赋。^①汉景帝末年,汉王朝的基础已经牢固地建立起来。这两方面巩固了汉朝统治及国力,使得东汉末年之前的整个汉朝受到外族的威胁较小,特别是汉武帝时期,汉朝得益于“文景之治”打下的基础,得以扩张,在汉武帝晚期及时进行战略收缩。这些国内联盟建设,为之后汉朝政权及国力的维持打下了基础。

在国际和国内因素驱动下,汉朝“强天下”得以践行,特别是在汉武帝时期。在国内建设的实力基础上,汉武帝得以在军事上主动且取得胜利。公元前133年起,李广、卫青、霍去病和程不识等将领指挥下,汉王朝军队进攻匈奴;公元前127年,已有可能在中国领土的西北端设朔方郡和五原郡;公元前121、公元前119年,卫青和霍去病把匈奴赶出中国边境,取得胜利,直到公元前103年再也没有匈奴侵入中国。在国内确立的儒学思想基础上,汉朝并没有对被征服地区实施严苛的专制统治,汉朝授予匈奴单于不是通常情况下的荣誉,作为另一个国家元首而不是臣属对待(名义上匈奴国不是“兄弟”之国,而是汉的外臣),接见时指定位于所有王公贵族之上,同时对单于加以一种“松散的控制”。周边国家也与汉朝建立了外交关系,^②汉朝在扩张之后也及时地收缩,如汉宣帝之后,^③汉朝没有陷入过度扩张的陷阱,或是在扩张之后及时战略收回,维系了汉朝的稳定。

^① 在公元前180至公元前141年期间,八次大赦;公元前167年,包括致残的特别严厉的刑罚被取消;帝国重大庆典时,普遍赐爵六次。公元前168年,标准税率从1/15减至1/30;次年,这项税全部被取消;公元前156年重新开征,仍是1/30,作为汉代标准税率。

^② 公元前121年,匈奴浑邪王投降,被移至北部,空出河西地区,汉朝直接和西域接触,与乌孙、大宛、康居、大夏、于阗建立关系。东汉授予西方纳贡国汉朝官员的称号,赋予称号的持有者以某种合法性和权威性,在汉朝衰亡以后,纳贡国仍长期重视它。晚至公元383年,当吕光平定龟兹时,许多西域国家归附了他,上交了他们保存很好的汉朝节传以表示对中国的忠诚。

^③ 敌对的单于之一韩邪拟定于公元前51年对汉朝廷访问,汉朝作为靠显示仁厚,而不是靠武力迫使外国人屈服以争取他们的友谊政策,给他以慷慨和隆重的待遇。西汉最后50年,对外政策不愿进行扩张,拒绝交锋。东汉开始,汉光武帝的军事姿态完全是防御性的。

(四) 亚文化三：柔天下

“柔天下”对“打天下”“守天下”的侧重都较强，这一亚文化支持使用和平、非军事手段推行天下主义。虽然追求“打天下”，但“守天下”也同样重要，“守天下”的目的使得“打天下”过程中，国家使用和平非军事手段，以感化或示范的方式，慢慢来建立天下。这一战略亚文化典型表现在使用高尚的名分，获得其他政权臣服。例如，唐朝统治者“天可汗”的称号，使得突厥部族归顺。

唐朝特别是在唐太宗时期，展现了卓越的儒家美德、成功的对外政策，使得唐朝能够归化边疆政权、设置羁縻府州，瓦解外部威胁，服膺少数民族政权，建立了“柔天下”。^① 相较而言，唐太宗晚期对朝鲜半岛的高句丽政权发动几次战役遭遇灾难性失败，吐蕃蚕食中亚、入侵西陲，阿拉伯人怛罗斯之战击败唐军，唐朝失去敦煌以西的控制权，使得唐朝（即使唐朝可能没有想过征服阿拉伯人）对这些政权无法用强硬的军事手段征服。^② “柔天下”使用的非军事手段主要表现在唐朝对待边疆敌对政权时，较多使用策动、分化、教化和归化的方式进行和平演变；以及在瓦解敌对政权后，设置羁縻以使少数民族地区服膺归顺。最明显表现在“天可汗”所象征的特殊关系，使得唐朝在公元 630 年获得突厥政权的支持。

在国际形势方面，北方游牧民族一直对中原地区构成威胁。公元六世纪后，突厥人统治中国北方的草原，公元 623 年后三年间经常发起进攻活动，起初李渊和李世民试图通过纳贡减轻压力，但阻止不了进攻。突厥人内部（如薛延陀部分裂）发生矛盾，部分支持唐王朝，之后突厥分为东西两汗国，暴风雪杀死了突厥人的牧群，唐朝在以薛延陀为首的铁勒诸部击败突厥汗国的基础上，趁机消灭了东突厥汗国，并将降唐的突厥部落安置在了关内道；公元 630 年，突厥人尊唐太宗为“天可汗”，明确承认唐太宗对突厥人有“下行可汗事”、“临统”的权利。西部汗国内部继续产生叛乱，公元 658 年，唐朝征服西突厥，在西突厥故地及西域全面进行政权建设。

^① 唐朝初期，即唐高宗时期，唐朝存在一定的安抚突厥政策，也属于非军事手段。至于唐太宗初期一改安抚政策并代之以征服，有一定的“强天下”特征，但其中包含了军事、外交、文化等措施的综合使用，唐太宗也逐渐的更为侧重“柔天下”。总体而言，唐朝属于“柔天下”的天下主义战略亚文化。

^② 西南地区南诏国在吐蕃与唐朝之间左右逢源，唐朝纯粹的军事征服只能限于交州地区（越南北部）。

公元八世纪,唐朝仍使用“天可汗”头衔所象征的特殊关系,从绿洲政权(如葛罗禄、拔野古、同罗、仆固、霫等)和回鹘(回纥)人处获得极为重要的支持,在西北与复兴的突厥国做斗争以及平息“安史之乱”时,回鹘在挽救唐王朝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如与郭子仪军队共同平乱、收复失土)。虽然在公元764年,唐朝叛将仆固怀恩勾结回纥、吐蕃人联军攻打长安,但随后回鹘与吐蕃关系破裂,唐朝把握住了主动权,与回鹘结盟,并依靠后者支持来抵抗吐蕃侵犯。唐开成年间,回鹘内部发生分裂,回鹘将军联合黠戛斯军队10万人灭回鹘汗国。

在这一系列的对外关系中,唐朝使用“天可汗”的称号不断使少数民族政权分化并归顺,主要以和平的手段,使得后者脱离原政权,归顺、支持唐朝或与之结盟。唐朝也因此消除了外部威胁,同时扩大了“天下”,并用羁縻府州的方式加强“天下”地区的归化。

在国内议程设定方面,“内部”与“外部”的关系在唐朝通过唐太宗确立的包容性联系在了一起。有关“内部”与“外部”关系的探讨,如狄仁杰曾言“天所以限夷狄而隔中外也”,^①认为内外的划分有地理和政治意义。公元642年,朝廷讨论如何处理刚刚征服的高昌(吐鲁番、新疆),褚遂良说明了中国领土与唐王朝暂时领有的土地之间的区别。白居易、褚遂良区分了中国本土与那些仅仅由王朝统治的地区(如在公元642年刚刚征服的高昌),在这一对经典的二元世界观描述中,古圣先贤确定了本土与外部世界的划分。^②然而,即使白居易、褚遂良等文人强调差异,但也是认为教化不成功则放弃,如若教化成功则让其归附华夏。公元630年,日本派遣第一批遣唐使来唐;公元640年,朝鲜的王族子弟与来自高昌(现新疆)、日本和吐蕃的王族子弟一起,在长安的国子监学习。唐朝继承了汉代尊崇儒家思想,使用儒术归化外族,通过文化价值观将周边政权联系在一起,成为东亚世界的中心。中华文化价值在唐代传遍东亚,当代关于“东亚价值观”的宣传中的诸多内容,都源起于这一时期传播的思想。

唐太宗提倡一种包容性观点,即所有民族最终都纳入中国的民族范畴。他声明夷狄与中国人享有共同的天性,统治者的仁慈保护必须包括两者。“自

① 指夷狄族群与唐朝内部存在内部与外部的界限与区隔。

② 与先前秦始皇在领土扩张中混淆了这一区别不同。

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①这种平等思想实际表现为唐太宗任用非汉人官员，授予他们军事头衔，甚至赠予他们中许多人皇室李姓。从公元七世纪后期和八世纪开始，朝廷依靠胡人将帅和军队为主要的军事力量。^②唐太宗宣布自己为天子兼天可汗，此后，唐王朝对西域各族的政策，主要是基于家族与北部和西部非汉族游牧民族的文化联系。^③在这个体系里，唐统治者利用突厥汗国的内部分裂，通过世代的庇护关系和外交礼仪把突厥人和其他较小的部落纳入一个更广阔的王朝体系，并把他们编入唐朝军队。唐朝学者由此也将中亚和北亚纳入华夏世界。^④

在国内联盟建设方面，藩镇制度与羁縻府州的设立，同时对突厥等北部地区居民的倚重，使得唐朝采用归化及非军事手段的倾向不断增强。^⑤在“天可汗”统治体系继续吸收北方汗国的基础上，羁縻制度稳固了唐朝对胡人的归化。唐朝设置羁縻、授予官职，安抚边疆民众，构成了唐朝与外族政权之间的缓冲带。投降的胡人聚集成日益扩大的县、府、州，以及在战略地区的都督府。这些组织部门隶属于效仿汉代治理西域的机构“都护府”。这些都护府形成了唐边境防卫和治理的基础。^⑥同时，藩镇制度也因外部威胁而加强。随着西部的吐蕃、西南的南诏、东部新罗和渤海、北部重建的突厥政权威胁上升，府兵和中央禁军制度变得无用而过时，武后击退契丹军队后，在北方和东北方建立永久性藩镇；公元742年，唐朝军队重组，全面防御机动性很强的敌人，把军队分拨给十个藩镇，边军将领被任命为节度使；公元747年，李林甫决定所有节度使应由胡人担任，认为职业军人更有才干，防止朝廷上出现的对手（因为节度使可以作为官员在中央政府获取更高职位的方式）。地方割据势力，使得唐朝中央无法直接使用强兵征服。再者，唐朝各族人口大融合，改变了中国与其他外部领域的关系。唐初，非汉人移民占唐朝总人口的7%，北方人口的12%—

① 司马光：《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6335—6368页。

② 中国边境的这些变化为一种新形态的外交关系设置了场景，这种外交关系在宋代形成了“中国与周边平等”这一概念。

③ 〔美〕陆威仪：《哈佛中国史：早期中华帝国、秦与汉》，第148页。

④ 〔美〕陆威仪：《哈佛中国史：早期中华帝国、秦与汉》，第一章；Mark Edward Lewis, *The Construction of Space in Early China*, SUNY Press, 2012; Marc S. Abramson, *Ethnic Identity in Tang Chin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11.

⑤ 北部地区居民还包括回鹘、铁勒、朝鲜、契丹、奚、靺鞨等，其中部分分布于安西、北庭、单于、安北、安东、安南等六大都护府所在的唐朝边境地区。

⑥ Pan Yihong, *Son of Heaven and Heavenly Qaghan: Sui-Tang China and Its Neighbors*, Center for East Asian Studies, 1997, pp. 180-181, 287-196.

14%，唐后期在10%—19%左右，特别是李氏贵族在游牧民族崛起时与之通婚，民族不断融合。在这一系列条件下，唐朝更多侧重使用非军事手段的“柔天下”扩展势力范围。

在外族袭扰和边疆动荡的压力下，加上唐朝“内部”与“外部”的探讨及“天可汗”统治抱负的国内议程设定，以及羁縻府州和藩镇制度的设立，各族大融合，加强了相关的国内联盟建设，唐朝选择了“柔天下”的战略文化。中华文化得以扩大，同时强大的敌人使得唐朝不能正面简单地使用强兵征服，唐朝因此采用了柔和的和平方式，教化、归化、分化、结盟等政策。唐朝使用中华文化教化胡人、羁縻府州与藩镇制度对缓冲带居民进行归化，同时又被藩镇的胡人节度使制衡，中央仅能使用非军事手段打击反派力量，将华夏天下体系扩大至中亚、北亚和东北亚等地区。

（五）亚文化四：弱天下

“弱天下”对“打天下”的侧重较弱，对“守天下”的侧重较强，主张无为与守成。这一战略亚文化典型表现在以天下秩序维系互不侵扰的关系。例如，宋朝与北方异族政权的对峙，就是弱天下的实践。

宋朝初期立志要收复失地，恢复汉唐时期的中国版图，本可以践行“强天下”的战略文化，^①但无奈国内改革也难以推行，没有军队及财政支持，伐辽受阻；同时，儒学的复兴与重建，文官制约武官、士大夫阶层的兴起。这些因素使得北宋统治者在与北方政权对峙时，选择了软弱或务实的互不侵犯和平政策。宋成为了古代中国历史上“地方主义”的典范，^②也即“弱天下”亚文化的体现所在。

在国际形势方面，自唐昭宣帝退位后，古代中国经历了十国政权五代的分裂，宋朝自建立开始就要和非汉族政权一起分享昔日唐朝的疆土。公元960年，赵匡胤建立宋朝，在之后几十年里，北宋统一南方各国及北汉，公元963年征服长江中游的南平、公元965年征服后蜀、公元971年南汉归顺、公元975年南唐归顺、公元976年征服吴越国、公元979年征服北汉，同时在继承的后周区域维持秩序。宋朝与异族政权的外交关系，宋太祖已经为后世和平共处的模

① 南宋岳飞抗金时期也有可能践行这一文化，但也因为国内因素受阻。

② 〔德〕迪特·库恩：《哈佛中国史：儒家统治的时代，宋的转型》，李文锋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

式铺平了道路。此后,东北部契丹国(辽国)、西北部党项王国(西夏),西南部大理王国(南诏)、南方的安南王国(越南)、西部边界吐蕃和吐谷浑,这些政权在不同时期与宋朝共同存在。

在国际形势之下,宋朝的统一进程多次由于辽国的干涉而受阻,以及北宋为金所灭,也属于国际冲击和国际压力,成为战略亚文化的形成条件。特别是在公元960年至公元980年间,甚至在公元979年统一北汉后,宋太宗时期宋军在高粱河战役、满城战役中惨败,宋真宗在位时宋军更是遭受了一连串的军事失败。公元1127年,金国攻陷开封,北宋灭亡,宋高宗建立南宋。面对辽与金的国际压力,宋朝需要选择战略进行应对。

在国内议程设定方面,宋真宗被认为是一位充满书卷气的皇帝,以文治之道施政,是个近乎理想的儒家统治者。面临好战的辽国契丹人的军事威胁,公元999年,宋真宗就想和契丹人讲和,但外交努力失败。^① 尽管在公元1004年,寇准说服宋真宗亲自指挥宋军作战,但军事冲突还在继续时,宋辽就举行了谈判,宋真宗担心战争的扩大,想停止双方的杀戮,在公元1005年签署盟约,史称“澶渊之盟”。^② 和约没有割让给北方异族任何领土,以可承受的代价成功使宋辽双方结束了敌对状态,但实际上承认了辽国皇帝与宋国皇帝对等,宋朝再无可能恢复唐朝的辉煌疆域。宋真宗把和平共处作为当时中国对外政策的一个合理选择,完成了宋朝的巩固,“澶渊之盟”对之后的和约树立了范例,包括公元1123年宋朝选择与金交换盟书,国家确定了与北方政权辽国乃至金国之间的战略走向。

在国内联盟建设方面,自“澶渊之盟”后,宋朝衰落,同时国内环境使得宋朝没有可能改变“弱天下”的局面。国内联盟建设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士大夫阶级与儒学和平主义思想的兴起,二是保守派对改革的抵制。宋太祖开创的文官控制武官的制度,结合科举制度,使得士大夫阶层崛起。同时,儒家学说在原则上对战争是谴责的,和平之路被视为王道,战争被认为是霸道。宋朝在面临进攻时表现得比较软弱。当时的儒家学说包括邵雍、周敦颐、张载及程颐、程颢兄弟,为儒家哲学走向成熟奠定了基础,在“澶渊之盟”后几十年里,

① 洪迈:《容斋随笔第五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305页。

② 谢善元:《李觀之生平及思想》,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8—9页。

巩固了和平主义这一意识形态。^① 改革派如李觏、范仲淹发动的庆历新政,以及后来的王安石变法,意图富国强兵,但都相继遭到司马光、苏轼等保守派的反对,保守派认为只要复兴儒家理念就可以让社会发生必要的变化。庆历新政于公元1044年失败,同年签订宋夏和约。宋神宗时期(公元1067至公元1085年)的王安石变法,在公元1085年宋神宗、王安石死后,公元1086至公元1093年王安石变法的成果新法被逐渐废除。这些国内联盟的建设,使得国家稳固了“弱天下”的战略亚文化。

在国际与国内因素驱动下,宋朝的“弱天下”战略文化,自公元1005年“澶渊之盟”、国家走向衰落后,经过国际形势压力、国内议程设定、国内联盟建设逐渐形成,表现在宋朝与北方政权的相处过程。宋辽(以及后来的宋金)之间出现了双元中心,“天无二日,民无二主”的原则遭到破坏,取而代之的是与北方强邻签订和约,辽宋“兄弟”相称(金宋之间或“叔侄”或“伯侄”相称),两方政权统治者都认为各自是天子,因而也出现了两个天下,宋朝的天下呈现出地方主义特点。同时,北宋务实的宰相在影响国家经济的财政事务上经验丰富,他们劝说皇帝,每年给异族支付岁币,远比把金钱投入结果无法预知的长期战争更为经济划算。由此可见,北宋对内政比对军事更为重视。地方主义与对内政偏重,体现了“弱天下”的战略文化特点。

通过对秦、汉、唐、宋四个王朝的案例研究,本文论述了天下主义战略四种亚文化在古代中国不同时期的体现。案例选取并未有照搬迪克的方法,选择一段连续的时期(美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一直到小布什政府时期)。该方法虽然可行,例如,在春秋战国时期寻找一系列的双边或多边国家关系,但在实际研究当中,可能会因为史料不足及国际体系的历史局限,使得案例研究变得牵强附会。所以,本文是在古代中国历史上选取典型,聚焦在每个王朝的突出特征,以体现天下主义战略文化特征,控制变量、总结规律,进而可以将类似的研究途径推广到其他历史时期的研究当中,或许本研究仅作为光谱描述的初步阶段,以期将来形成完整而详细的古代中国战略文化变迁脉络。

天下主义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各个亚文化选择,使得该历史时期学者或政

^① 期间还包括印刷术的诞生,普及儒家学说、规定书籍出版,国家取得对知识增长的控制权,也控制了意识形态的发展。

治家著书立说,也将这些特征刻入古代中国的战略文化基因之中。借助这一套天下主义战略文化分类,研究者得以研究中国的战略定位及走向。

结 语

本文试图以当代战略文化的研究框架,总结出中国古代的天下主义战略文化,回答“天下主义战略文化是什么”这一问题,以此与主流国际关系学界对话。既往文献从身份构建、外交决策、制度设计来看待天下主义,但这一划分并不能很好的概括古代中国的战略文化,不精确的划分更难以描述战略文化的演变,这个问题也出现在主流国际关系领域对战略文化的研究上。参照迪克将美国自由主义战略文化划分为主文化与四大亚文化,笔者将天下主义的“打天下”与“守天下”特征,对比自由主义主文化的“势力范围”与“有限责任”特征;将“强天下”“弱天下”“柔天下”“名天下”四种战略亚文化,对比自由主义亚文化的“国际主义”“民族主义”“进步主义”“现实主义”。

通过秦、汉、唐、宋四个王朝的案例研究,描述了天下主义战略主文化特征,及其在王朝不同时期的亚文化体现。在这一研究完成之后,以期未来描述完整的古代中国战略文化变迁,甚至是当代中国战略走势,提供理论与现实意义。纵观历史,对中国而言,天下主义的建构有利于自身战略定位与走向的把握,在如崛起、成为主导力量等不同时期的战略制定有着重要指导作用;对其他国家而言,天下主义的研究则有利于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理解。